本书主要运用了政治史与家族史相结合的研究方式，致力于探讨魏晋之际的政治变化以及家族网络在其中的作用（作者绪论语）。笔者阅读了本书之后，又读了作者仇鹿鸣的学兄范兆飞写的长文书评，范评读起来虽有苛刻之嫌，然大都言之有据，且对本书的成就不乏无保留地赞赏，其严苛之处大抵源自个人之性格，非有意针对。笔者对魏晋史涉猎有限，故专业上的内容，范评已经对本书做了较为完备的评析，在此不必班门弄斧。

就非专业读者的角度来说，本书写得是极为晓畅明白的，无怪乎能够得到大众书评人的普遍好评。陈寅恪的论断，或许到目前为止，都是现代学术框架下魏晋隋唐史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术分析，本书和许多后来者一样，都对陈氏的论述做了修正。但奇怪的是，无论陈氏的论断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了“过时”的观点，至今尚未有学者能够在同一领域取代陈寅恪的地位。也就是说，剥离掉陈氏的学术判断，陈寅恪仍旧是最有影响力的魏晋隋唐史学者。这在某种程度上颇有些吊诡，细细考虑，或许是由于陈寅恪是唯一既能开创一套可供后来者利用的方法论，又能够提出完整的分析的框架的学者。后来者虽对其所构建的结构有所匡正，但往往仍利用了其分析工具，同时只是做些零碎的工作，未能提出一个相同体量的结论以完全取代陈氏的框架。如本书的作者来说，就范评所提出的问题来看，本书实有许多可供深入、再讨论的地方，但作者后来的兴趣已经转移到了唐史的研究上，因而就来不及将已有的研究往细再深挖一层。

从范评中可以看出来的是，魏晋政治史的“核心”历史研究（政治、制度、经济史）已经基本上处于“题无剩意”、“穷途末路”的状况了，本书虽仍是在政治史上耕耘，成果也颇为可观。但如一位书评人所说，本书的成功靠的不是发展出一种新的方法论，而是作者本人的才气，具有不可持续性，或许这也是作者后来转移至唐史研究的原因之一。范评以为“仇著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具有‘一石激起千层浪’的学术效应”，这无疑是正确的。不过，范兆飞认为，若要中古政治史恢复昔日的霸主地位，非得新史料的大规模涌现不可。对此笔者未必能完全认同，有时候学术的压力并不总是来自内部。就笔者粗窥，如若能够将特定时期的历史与更为广阔的时间背景相联系，或可为出路之一。